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公开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研究生姓名: 王淼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王庆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 财政学

研究方向: 财政理论与政策

提交日期: 2023年5月31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王峰 签字日期： 2023.5.31

导师签名： 王峰 签字日期： 2023.5.31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王峰 签字日期： 2023.5.31

导师签名： 王峰 签字日期： 2023.5.31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uman Capital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andidate : Wang Miao

Supervisor: Wang Qing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奇迹,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下,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方式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而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现阶段,我国仍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等问题,因此,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解决当前产业结构升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例如,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等。本文试图从财政分权的视角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探究财政分权、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首先,基于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展开阐述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并对财政分权、人力资本及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概念界定,介绍相关理论基础;其次,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和理论机制,提出了四个假说;最后,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202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实证结果并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四个假说。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以全国为样本,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2)分区域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3)从传导机制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均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作用;(4)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5)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根据结论本文提出四点建议:(1)适时调整财政分权水平;(2)完善政绩考核机制;(3)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4)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实力。

关键词: 财政分权 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升级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achieved a miracle of rapid growth.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rapid growth,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rty's Report to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ointed out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Finance, as the foundation and important pillar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Chinese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the assessment methods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and then will have a direct or indirect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China is still facing the problems of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low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must solve the current practical problems fac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such as weak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low level of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Firstly, based on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rough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situation is elaborated, and the concepts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re defined, and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 is introduced.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four hypotheses. Finally, based on the balanced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20,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uman capit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btains empirical results and verifies the four hypothese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Taking the whole country as a sample, fiscal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have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2) From a sub-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impact of fiscal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present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iscal revenue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can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affecting human capital; (4)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5)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ca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1) Adjust the level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a timely manner; (2)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Mechanism; (3)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expenditure; (4) Enterprises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their own strength.

Key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anpower capital; Upgrading of an industrial structure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3
1.2.1 研究内容	3
1.2.2 研究方法	4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5
1.3.1 研究思路	5
1.3.2 基本框架	6
2 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7
2.1 文献综述	7
2.1.1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7
2.1.2 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8
2.1.3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8
2.2 概念界定	10
2.2.1 财政分权	10
2.2.2 人力资本	11
2.2.3 产业结构升级	12
2.3 理论基础	13
2.3.1 财政分权的理论基础	13
2.3.2 人力资本的理论基础	14
2.3.3 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	15
3 我国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	17
3.1 财政分权现状分析	17
3.1.1 财政收入分权	17
3.1.2 财政支出分权	18

3.2 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19
3.2.1 人力资本整体情况分析	20
3.2.2 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20
3.2.3 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21
3.2.4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22
3.3 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分析	24
3.3.1 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24
3.3.2 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现状分析	26
3.3.3 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分析	27
4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分析	29
4.1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29
4.1.1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	29
4.1.2 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30
4.2 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	30
4.3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31
5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33
5.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33
5.1.1 变量选取	33
5.1.2 样本与数据来源	35
5.2 实证研究设计	36
5.3 实证结果分析	37
5.3.1 基准回归分析	37
5.3.2 稳健性检验	39
5.3.3 异质性分析	40
5.3.4 影响机制分析	41
5.3.5 进一步分析	42
5.4 本章小结	43
6 结论及建议	44

6.1 研究结论	44
6.2 政策建议	45
6.2.1 适时调整财政分权水平	46
6.2.2 完善政绩考核机制	46
6.2.3 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	47
6.2.4 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实力	47
参考文献	49
致 谢	53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奇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自 2012 年十八大召开到 2022 年二十大召开的十年间，我国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生产总值从 538580 亿元增长到 1210207.2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 39771 元增加到 85698 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财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产业的快速发展。究其原因，“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周黎安，2007）^[61]。在中国式分权制度下，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方式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中央政府重在搞经济建设，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晋升，大力发展当地经济。但是，在“任期制”的条件下，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晋升，往往会追求短期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忽略了长期的经济发展，甚至不考虑环境的可承受能力来发展当地经济。面对现阶段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体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绩效指标需要纳入地方官员考核体系，成为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突破经济发展障碍，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各地方政府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

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现阶段，我国仍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高质量发展遇到瓶颈，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等方面。因此，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解决当前产业结构升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例如，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等。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分权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

为，进而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财政分权的视角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探究财政分权、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第一，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国情，本文综合考虑了我国国情和制度背景，从财政分权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财政分权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解决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提供财政方面的理论支持。本文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分析，揭示财政分权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第二，立足于地区间产业结构升级情况的差异，通过构建模型将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纳入研究框架，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这一研究为财政学、区域经济学以及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地区间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长期以来，针对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由于概念界定和指标选取的不同，导致实证研究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结论的整理与比较，从理论层面阐述了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研究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2. 现实意义

第一，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方政府行为，进而会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因此，研究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对现阶段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财政分权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完善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一方面关注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关注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对其中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这对我国今后产业结构升级有方向启示作用。

第三，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来看，本文从现状入手，结合实证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从实际应用价值来看，

研究不同地区财政分权、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有助于中央政府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升级，统筹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各区域也可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优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指导意义。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

第二章，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基于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思路，综合阐述目前国内外在该方向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财政分权、人力资本及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概念界定，并介绍其相关理论基础。

第三章，我国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首先，梳理了财政分权的现状并对现状进行分析；其次，梳理了人力资本的现状并对现状进行分析；最后，梳理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并对现状进行分析。

第四章，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分析。首先分析了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说：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次，分析了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提出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说：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再次，进行了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本文的第三个假说：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最后，进行了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本文的第四个假说：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第五章，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本文通过运用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同时进行了稳健性

检验、异质性分析和影响机制分析，得出相应的实证结果并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四个假说。

第六章，结论及建议。根据前文的实证分析结果，总结概括出全文的研究结论：（1）以全国为样本，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2）分区域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3）从传导机制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均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作用；（4）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5）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根据结论本文提出四点建议：（1）适时调整财政分权水平；（2）完善政绩考核机制；（3）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4）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实力。

1.2.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通过对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关文献进行研读，梳理和总结学者们对该问题的研究进展，深入学习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内容，为本文探索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

2. 理论分析法

通过综合运用财政分权相关理论、人力资本相关理论及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理论，同时结合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从理论上分析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

3. 实证分析法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相关指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构建模型，对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实证分析，并分为东、中、西部地区分别研究，得出相应的实证结果同时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说。

4. 比较研究法

首先在现状分析部分，通过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研究了财政分权和人力资本的现状；其次在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通过东部、中部及西部的实证结果，对比分析了不同区域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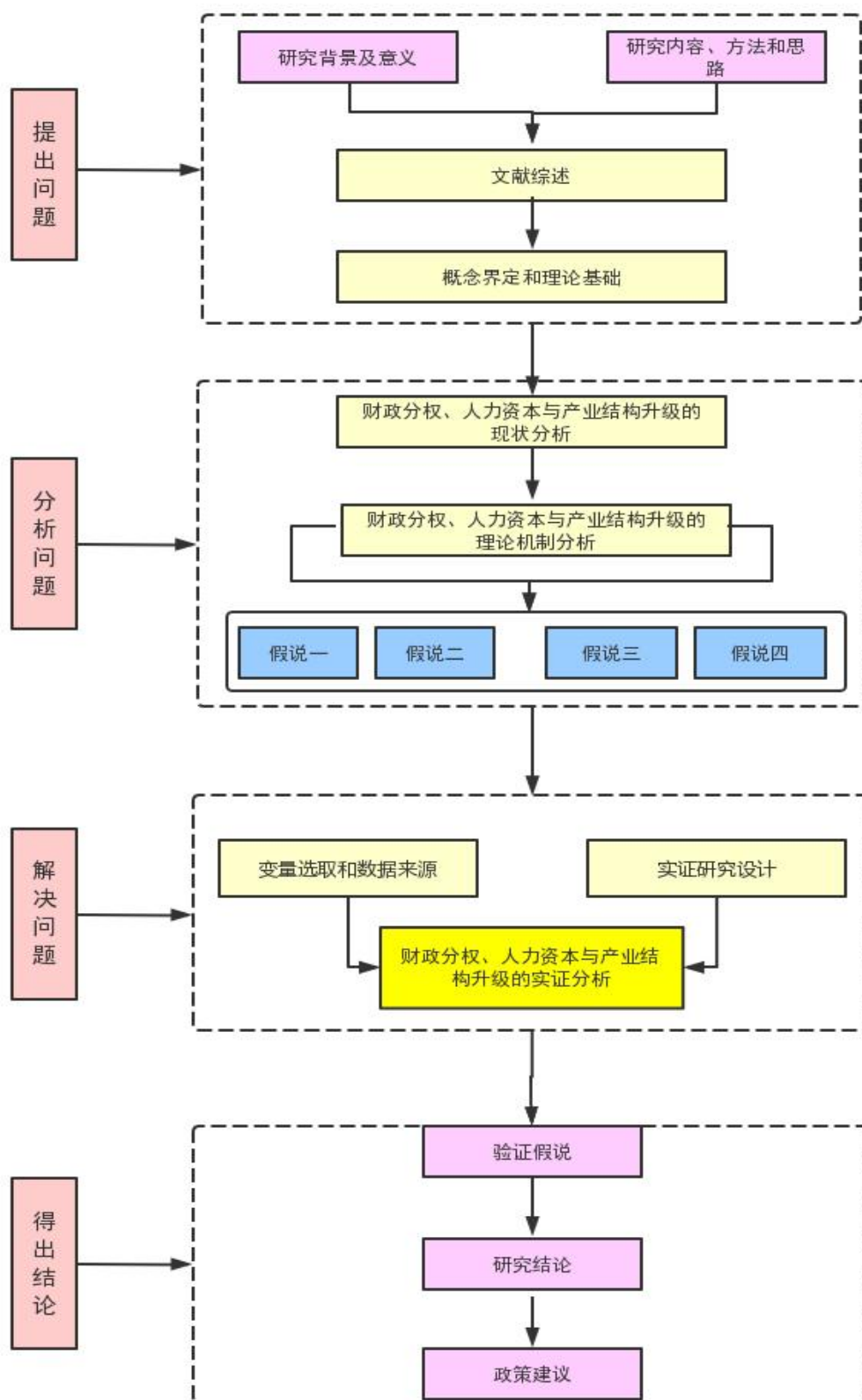
差异；最后在政策建议中，针对不同区域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1.3.1 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已有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尝试性的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对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现状分析和理论机制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然后基于我国 31 个省份 2007-2020 年的省级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分析，最后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整篇论文严格遵循“理论分析—提出假说—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分析思路，深入剖析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传导机制，以期探寻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化路径。

1.3.2 基本框架



2 文献综述、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在进行全文的论述和分析之前，本章对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已有文献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总结，在众多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总结概念，论述相关的理论，为后文的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分析提供可借鉴的研究基础。

2.1 文献综述

2.1.1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

从现有文献来看，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1) 财政分权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王立勇和高玉胭（2018）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得出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42]。黄琼和李光龙（2019）以我国 30 个省份 2006-2017 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得出财政分权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5]。杨志安和李梦涵（2019）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和支出角度财政分权度的提升均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49]。

(2)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影响

张浩天和李鑫（2017）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剧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失衡，并得出在财政分权影响下，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失衡程度大于中东部地区^[53]。胡晓双和裴潇（2020）经过研究得出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本地及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4]。

(3)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

崔志坤和李菁菁（2015）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其中，财政收入分权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消极影响，而财政支出分权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14]。刘建民和胡小梅（2017）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非对称的空间溢出效应^[33]。

2.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

王立勇和高玉胭（2018）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能够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

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稳健性检验证实这一结论^[42]。收入和支出角度的财政分权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杨志安和李梦涵,2019),地方政府的投资偏好、市场保护、科技投入、环境保护等行为(甘行琼等,2020)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胡晓双和裴潇(2020)研究发现环境税与财政分权的协同作用对本地与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4]。

综合来看,随着研究样本、所考虑的变量及所用的实证方法不同,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会随之而发生变化。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7-202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试图去探究财政分权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及财政分权是否会通过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间接影响。

2.1.2 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针对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定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种结论。余靖雯(2012)研究发现当地方政府对人力资本积累作用越大时,越应该分权^[51]。赵领娣和张磊(2013)以我国197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呈显著的负向关系,同时得出分税制改革抑制了地方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热情^[57]。李凡和马万里(2013)认为财政分权横向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人力资本支出长期不足,且呈现结构不均等^[28]。孟望生(2018)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得出财政分权对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具有促进作用^[35]。高春亮和李善同(2019)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19]。高琳(2021)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抑制人力资本水平阻碍了生产率增长,分权(主要是县级分权)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减少了高技能劳动力占比^[20]。张莉娜和吕祥伟(2021)以我国2007-2017年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实证研究得出财政分权抑制了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55]。

2.1.3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学者们将人力资本进一步细分,得出不同的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呈现差异。何菊莲等(2013)通

过研究得出结论,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2]。何小钢等(2020)研究认为高质量人力资本扩张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且该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强^[23]。孙海波和林秀梅(2018)研究发现, 初级人力资本显著地抑制产业结构升级, 中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高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不断增强^[38]。陈朝阳等(2020)应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得出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和人力资本内部结构均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但是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13]。朱喜安和梁艳艳(2022)构造基础型、教育型和技能型人力资本指标, 发现基础型和教育型人力资本促进本省产业结构优化水平^[64]。王帅龙和李豫新(2022)研究表明, 创新型人力资本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43]。

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来具体分析人力资本的作用, 发现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更进一步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也会因为所处的区域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作用。

1.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张阳和姜学民(2016)采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得出, 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但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却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56]。林春艳等(2017)通过构建动态空间 Durbin 模型研究表明, 人力资本存量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呈现正向促进作用^[31]。

2.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周海银(2014)研究结果表明, 从全国总体来看, 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60]。张阳和姜学民(2016)研究认为, 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但人力资本分布结构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负向作用^[56]。林春艳等(2017)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结构的提高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31]。白婧和冯晓阳(2020)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对加快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有着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 这种间接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升创新能力水平来促进产业高级化发展^[12]。杨永聪等(2022)研究发现相比产业结构合理化, 人才政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更大^[48]。

3.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周海银(2014)研究发现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最为显著, 中西

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不显著^[60]。郑玉（2017）运用 Getis 空间过滤模型研究发现：东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和贡献最强、东北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58]。孙海波等（2017）基于我国 2003-2013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得出，东部省份已进入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尚未跨越经济发展水平的临界值，人力资本集聚暂时不利于这些省份产业结构改善^[37]。孙海波和林秀梅（2018）研究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中、高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正向促进作用^[38]。李敏等（202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东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用高于西部，中部地区效用不显著^[30]。杨永聪等（2022）认为人才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48]。

2.2 概念界定

2.2.1 财政分权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将一定的税收权与支出责任下放至地方政府，并且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决定其财政支出的规模与结构^[21]。财政分权是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对于本地的实际情况了解程度高于中央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能清楚地知道本地的实际情况，从而能够更好更有效率的提供适合当地居民的社会公共服务，更有效的配置有限资源，使得本辖区内居民福利不断提高、优化。

我国财政体制建立的基本原则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它是在财政管理体制中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之间在预算管理和资金使用上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经历了中央计划的统收统支、财政包干与分税制三个大阶段。“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16]。自 1994 年分税制实施以来，学者们针对财政分权给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看，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统一定论。在不同的时间区域内，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所差异，1994 年以前它对经济增长并无促进作用，而 1994 年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作用十分显著（周业安和章泉，2008）^[62]。温娇秀（2006）、范子英和张军（2009）、李国璋和刘津汝（2010）、周东明（2012）、孙勇（2017）、余世勇和朱咸永（2019）、吕勇斌等（2020）、张莉娜和吕祥伟（2021）经过不同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周业安和章泉（2008）、林勇和卓玛草（2013）认为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杨志安和邱国庆（2019）、孙萌和台航（2019）实证研究得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2.2.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所以又称为非物质资本，是依附于劳动者自身的资本，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技术水平与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不会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从“干中学”与知识外溢的角度出发，人力资本有别于物质资本的特点是，人能够通过不断地学习来获得更高水平的能力，且所获得的能力不随着产品的转移而消失，人力资本具有累积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所积累的知识技能能够为自身带来物质报酬和精神嘉奖，人力资本具有外溢性，这种能力同时也会给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在职培训，卫生保健措施等，都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

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有更大的增值空间，因为人具有创新性、创造性，特别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本将有更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是强化管理方式，调整企业发展战略，都离不开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必不可少的环节。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熟练劳动力占比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远低于发达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技术不能得到有效使用，从而阻碍产业升级和转型^[1]。杨志安和李梦涵（2019）从实证角度为财政分权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49]。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关键要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当地的高等教育建设，重视就地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远期发展储备人才；另一方面通过人才引进来快速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重在解决当前迫切的人才需求。随着户籍制度的不断改革，大多数人才开始“用脚投票”，由于高水平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各地方政府为获得更优质的人才展开

激烈的竞争，竞相提供优质的待遇以吸纳人才，同时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来吸引人才流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引导当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给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同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2.2.3 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的构成、联系和比例关系。Kuznets (1969) 研究得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是伴随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的^[4]。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部门分工不断细化，产生了许多新兴生产部门，同时也淘汰了一些旧的生产部门，这些不同的生产部门组成导致产业结构不断变化，从而满足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在一个经济实体当中(一般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在每个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总是存在差异，并且产业结构总是朝着有利于各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地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变的过程，周振华(1990)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方面^[63]。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为促进经济发展，根据该阶段的科技发展水平、消费需求水平、资源优势情况、人口基数等因素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化不是简单的产业间的绝对均衡，而是有限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高度化指的是在既定经济发展阶段，通过合理调整现有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促使产业结构从低水平阶段向高水平阶段发展的过程。从产业结构的结构比例来看，产业结构高度化具体表现在产业重点依次由第一次产业为主依次向第二次、第三次产业为主的方向发展、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金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由制造初级产品为主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为主的方向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构成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基本点。史忠良(2005)将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分为需求结构、投资结构、资源禀赋、外部环境和科技进步五大方面^[36]。

2.3 理论基础

2.3.1 财政分权的理论基础

1.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 Tiebout (1956) 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论文“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为标志^[10],并经 Musgrave (1959)、Oates (1972) 等代表学者不断发展和完善。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主要探讨公共物品的提供责任,论证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研究政府怎么做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具体理论如下:

Tiebout (1956) 在《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模型,引入竞争性市场概念,提出了“以脚投票”理论。该理论假设居民可以自由流动,他们会根据自身对于公共产品和税收政策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因此,各地方政府可根据居民的偏好来提供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打破了过去全国统一供应公共物品的局限,将有限资源重新配置,实现帕累托改进,从而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Musgrave (1959) 肯定了中央政府的重要作用和必要性,相比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承担着宏观调控的作用,即维持经济稳定和发展,协调居民收入再分配及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6]。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有其存在的重要作用和必要性,在资源配置方面,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决定了它更了解本地区居民的情况,能更有效率地为本地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分配充分体现了财政分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Oates (1972) 在《财政联邦主义》中,基于一系列前提假设,通过构建模型将全部样本分为两组,保证每组内的人具有相同的偏好,不同组之间的偏好存在差异,分析得出:在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标准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有差别的提供公共产品比中央政府等量分配公共产品效率更高。相比之下,分权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而集权会导致部分无谓损失,由此验证了财政分权的必要性,这就是奥茨分权定理。因此,在资源配置方面,中央政府应充分考虑收益与成本,适度将财政收支权利下放到地方政府,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2.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为“市场保护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 Weingast（1995）、Qian & Roland（1998）等为代表。他们从更现实的假设出发，假定政府官员的目的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制度，部分政府官员在决策时就很容易为了实现自身的效用而出现“寻租”行为。因此，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引入激励相容机制，约束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防止其在财政收支权利下放至地方政府时，地方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作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决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另一方面，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会导致各地方政府间产生竞争，促使各地方政府采取保护和促进市场发展的措施。总体而言，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相比，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激励和地方政府竞争等联系起来。

以钱颖一等为代表的学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式分权”的概念，学者们在理论上用这一概念阐释了我国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激励与约束。“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结合，傅勇和张晏（2007）使用这一概念，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16]。周黎安（2007）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重要补充，研究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模式“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的性质与特征，并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61]。张军（2008）以 1978 年之后的财政分权为依托，回顾和讨论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经验研究的成果，从一个角度讲述了转型与增长的中国故事^[54]。

2.3.2 人力资本的理论基础

1776 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第一次将人的才能视为资本，他认为专业化的分工以及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47]。在肯定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工人的劳动能力与水平会受到其熟练程度的影响，这种熟练水平可以通过接受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来改善，当然这一过程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被视为对

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个人为提高劳动技能水平花费的支出是他所拥有财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财产的组成部分,这笔支出可以通过获得更高工资得到补偿。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发表的著作《论人力资本投资》中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内容、形成方式与途径,他认为人力资本既具有数量特征又具有质量特征,其中,数量特征包括总人口数量、实际劳动者数量等,质量特征包括技术水平、知识水平等^[46]。他将体现在劳动者身上无形的能力称为人力资本,强调劳动者能力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经济飞速增长,因此有必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水平。

贝克尔与舒尔茨不同,他从微观的视角切入,并运用经济数学方法对人力资本进行分析^[26]。在其著作《人力资本》中,他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分析了人力资本的性质及其投资行为,并利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了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他认为个人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构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的均衡模型,将花费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支出与个人收入结合起来,由此得出收益更高的人更愿意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

2.3.3 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基础

1. 配第-克拉克定律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早注意到产业结构之间的演变趋势,17世纪,威廉·配第在其著作《政治算术》中通过对英国和荷兰的产业结构进行研究,提出商业比工业收入多,工业又比农业收入多,从而会影响产业间劳动力的流动,导致大量劳动力朝着农业、工业、商业的方向流动^[44]。他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

在威廉·配第研究的基础上,克拉克建立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从而形成了配第-克拉克定律。20世纪40年代,克拉克在其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按照三次产业划分方法,通过分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得出劳动力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地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再转移至第三产业^[27]。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同时,不同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了劳动力的不断转

移。

2. 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

在威廉·配第、克拉克等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产业结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动受人均国民收入变动的影 响，这一规律被称为“库兹涅茨人均收入影响论”^[9]。他改进了研究方法，将第一产业称为农业部门、第二产业称为工业部门、第三产业称为服务部门，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及人均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农业部门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占比则不断上升。从就业来看，农业部门就业占比不断下降，工业部门基本没有变化，服务部门则不断上升，进一步完善了产业结构理论。

3. 赤松要雁形形态理论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通过研究日本棉纺工业的发展情况后提出著名的“雁行形态论”。他认为产业发展都要经历三个浪潮，分别是进口、国内生产、出口，其图形就如同三只大雁展翅翱翔。他强调后进国家在对外开放后由于自身市场、产业结构等尚不成熟，首先会形成进口浪潮，随着国外产品不断流入，本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量生产替代产品，进而形成国内生产浪潮，最后，国内产品利用其低成本的优势，出口量不断增加，形成出口浪潮。这一理论阐述了后进国家是如何发展本国产业，逐步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并通过这一过程逐渐追上先进国家。

4. 不平衡增长理论

1958年，德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他从资源的稀缺性角度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所掌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同时，不同地区所具备的条件也存在差异，区位优势不同，无法实现全面均衡的发展一切部门，因此他主张将有限的资源有选择的投放到某些部门，最大限度的发挥有限资源的作用，快速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通过这些部门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应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体部门的发展。

5. 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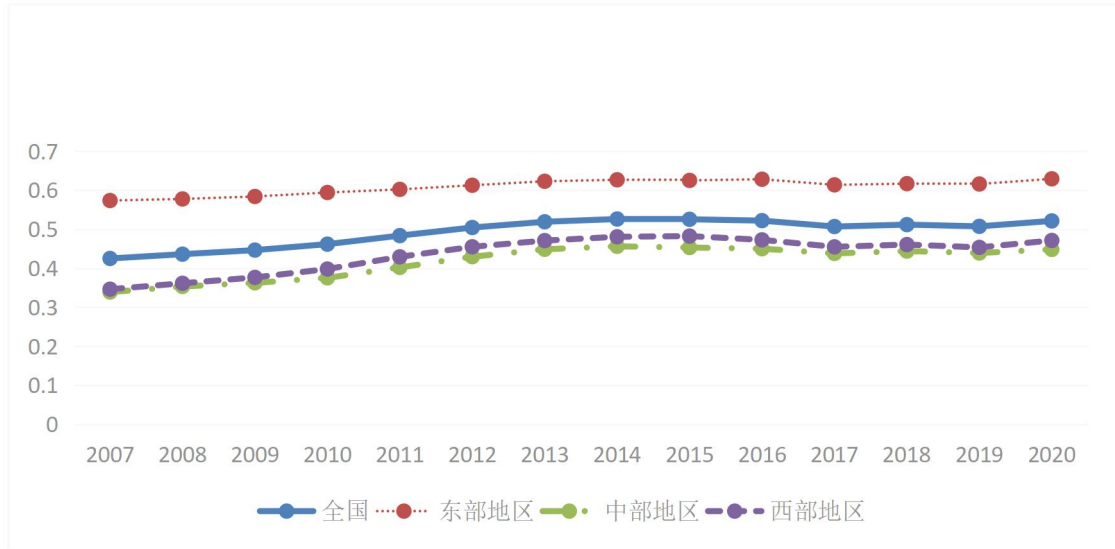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主导产业能够快速吸收新技术,获得发展的新动力,具有较高的增长潜力,并且具有很强的扩散效应,能够在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通过后向效应、旁侧效应及前向效应三种扩散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9]。他将经济成长分为六个阶段,并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来解释每个阶段的演进,认为主导部门的快速扩张是推动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所在。主导产业的形成需要耗费大量投资,对技术和人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主导产业能够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升级。

3 我国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现状

3.1 财政分权现状分析

如何衡量财政分权,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考虑到张浩天和李鑫(2017)、刘建民和胡小梅(2017)、甘行琼等(2020)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不同,本文分别引入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共同衡量财政分权,借鉴甘行琼等(2020)将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收入/(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收入+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收入),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支出/(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支出+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收入分权指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标,更加全面的衡量财政分权,以便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与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17]。

3.1.1 财政收入分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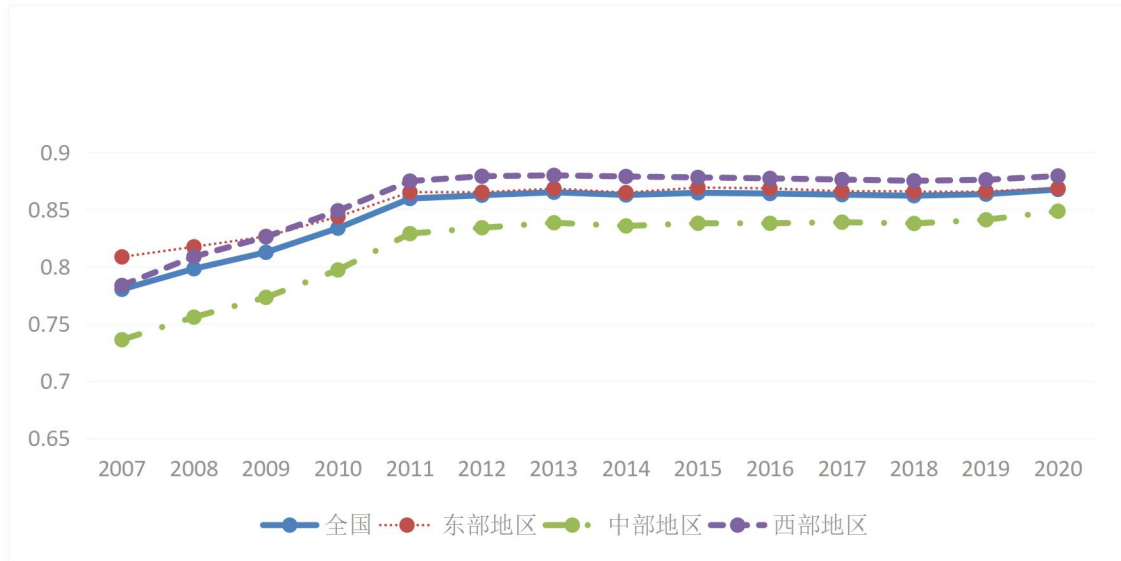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图 3.1 2007-2020 年全国及分地区财政收入分权折线图

图 3.1 所示是 2007-2020 年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①财政收入分权的变动情况。根据图 3.1 可知，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分权总体上呈现平稳的态势，从 2007 年到 2020 年整体变动幅度较小，增加了 0.096。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分权整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分权相差不大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东部地区财政收入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财力不足导致其对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依赖较高，符合现实情况。

3.1.2 财政支出分权

^①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图 3.2 2007-2020 年全国及分地区财政支出分权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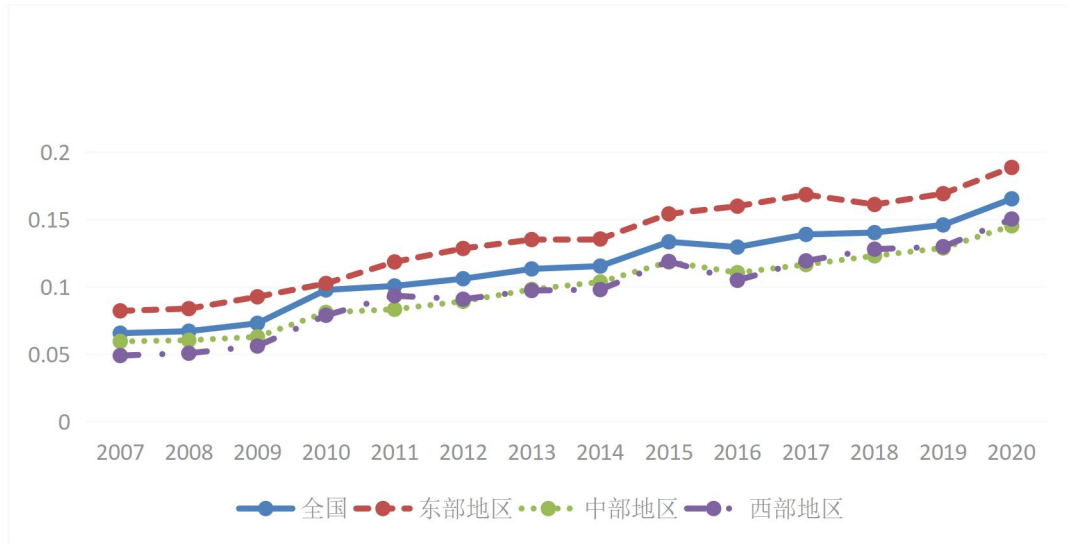
图 3.2 所示是 2007-2020 年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分权的变动情况。根据图 3.2 可知，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我国财政支出分权总体上在 2007 年至 2011 年间快速增长，在 2011 年至 2020 年间呈现平稳态势。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分权整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及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西部地区整体上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07 年至 2011 年间，在财政支出分权大幅度上升的同时，财政收入分权的上升幅度较缓，2020 年，财政支出分权度比财政收入分权度高 0.35，各省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这说明当前部分省份的财政收入仍不能完全弥补其财政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财政压力，体现了当前各省份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状。

3.2 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人力资本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人力资本的数量要满足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其次，人力资本的质量要符合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本文参考众多学者的做法，采用各个省份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占各个省份 6 岁及以上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3.2.1 人力资本整体情况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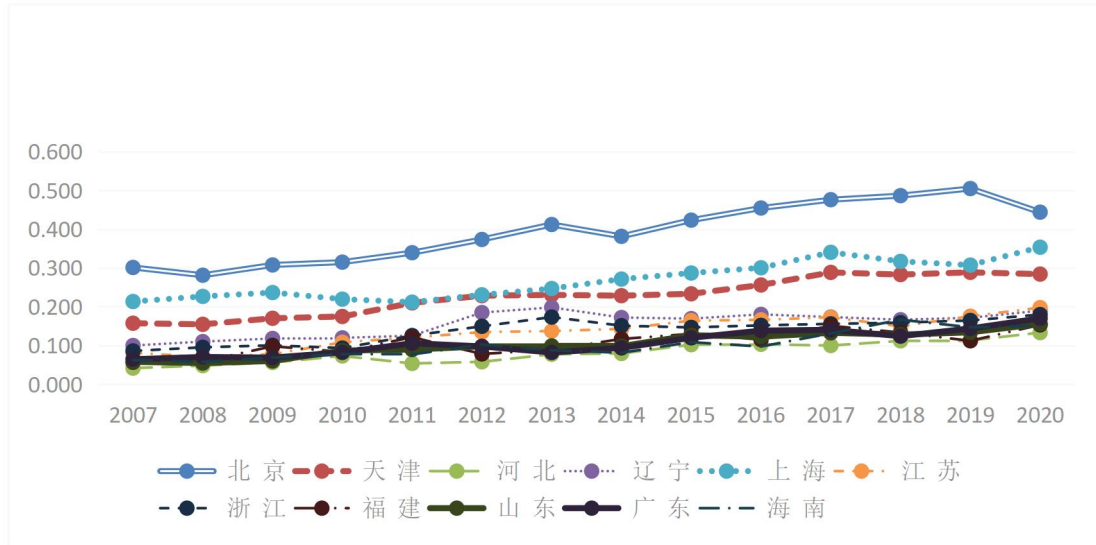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图 3.3 2007-2020 年全国及分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折线图

图 3.3 所示是 2007-2020 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情况，根据图 3.3 可以看出，全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整体趋势向上，2007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我国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占比为 6.56%，到 2020 年，这一数据提升为 16.51%。其中，东部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在 2007-2020 年间始终高于中西部地区，2007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东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占比为 8.21%，到 2020 年，这一数据提升为 18.84%。中部地区和西部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整体相差不大，2007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中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占比为 5.95%，西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占比为 4.90%，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 1.05%。2020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中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 14.51%，西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为 15.01%，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 0.5%。

3.2.2 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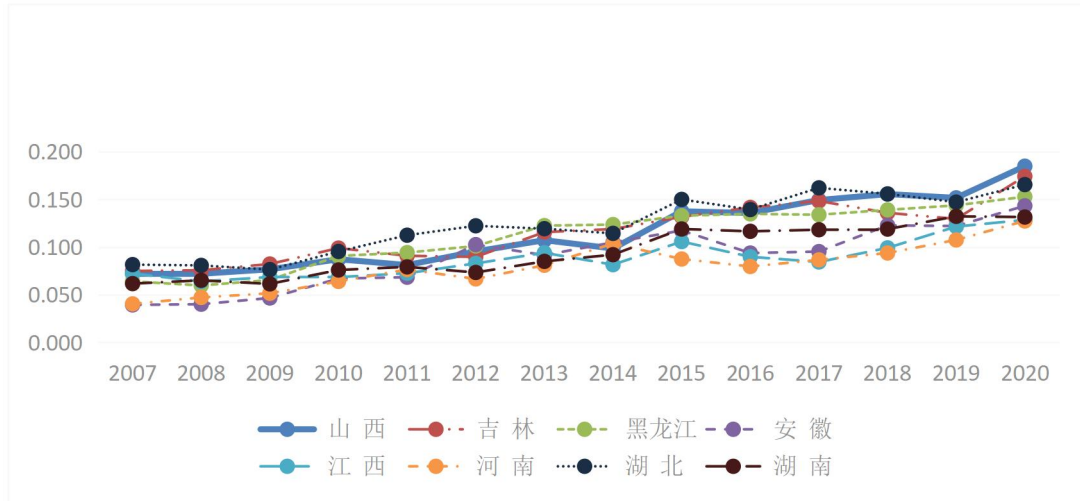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图 3.4 2007-2020 年东部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折线图

图 3.4 所示是 2007-2020 年东部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情况，根据图 3.4 可以看出，在 2007-2020 年间，北京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占比高于其他东部省份，其次是上海和天津。2007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占比分别为 30.1%、15.7%、4.2%、10%、21.3%、8.1%、8.6%、5.7%、5.8%、6.5%、6.3%，排名先后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浙江、江苏、广东、海南、山东、福建、河北。2020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分别为 44.4%、28.4%、13.3%、19%、35.3%、19.8%、18%、15.3%、15.6%、17%、15.1%，排名先后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浙江、广东、山东、福建、海南、河北，排名先后发生变化。

3.2.3 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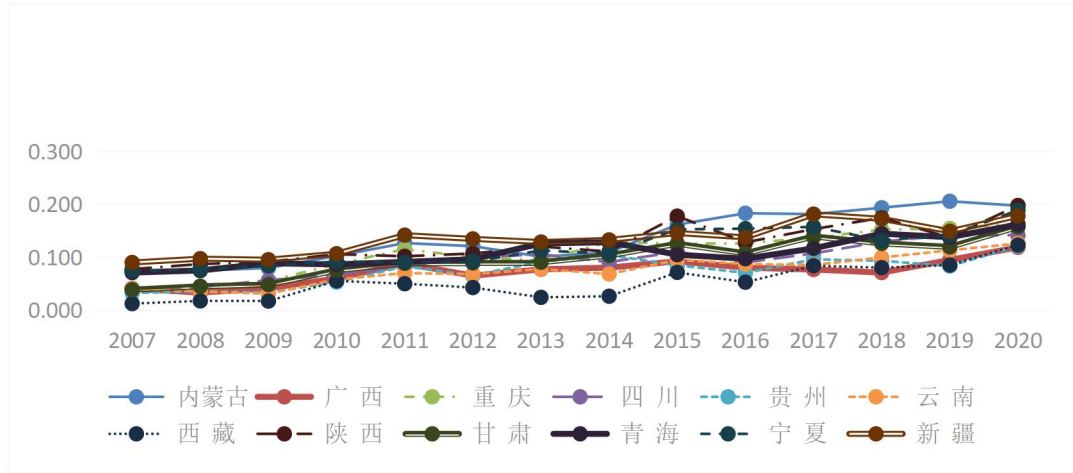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图 3.5 2007-2020 年中中部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折线图

图 3.5 所示是 2007-2020 年中中部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情况，根据图 3.5 可以看出，在 2007-2020 年间，中部地区各省份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差不大。2007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分别为 7.2%、7.5%、6.4%、3.9%、7.2%、4%、8.2%、6.2%，排名先后为湖北、吉林、山西、江西、黑龙江、湖南、河南、安徽。2020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分别为 18.5%、17.4%、15.3%、14.3%、12.8%、12.7%、16.5%、13.1%，排名先后为山西、吉林、湖北、黑龙江、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排名先后发生变化。

3.2.4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现状分析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图 3.6 2007-2020 年西部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折线图

图 3.6 所示是 2007-2020 年西部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情况，根据图 3.6 可以看出，在 2007-2020 年间，西部地区整体的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差不大。2007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分别为 7.5%、4%、3.8%、4.1%、3.2%、4%、1.2%、7.7%、3.8%、7.1%、7.4%、9%，排名先后为新疆、陕西、内蒙古、宁夏、青海、四川、广西、云南、重庆、甘肃、贵州、西藏。2020 年，在 6 岁及以上人口中，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分别为 19.7%、11.8%、16.4%、14.1%、12.1%、12.6%、12.3%、19.8%、15.7%、16.2%、18.9%、17.8%，排名先后为陕西、内蒙古、宁夏、新疆、重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西藏、贵州、广西，排名先后发生变化。

总体来看，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并不高，从 2007 年到 2020 年，我国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基本呈现增长趋势，首先从招生来看，这与全国各地普通高等院校的扩招有一定的关系，其次从就业来看，由于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对求职者的学历有硬性要求，导致很多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不得不选择提升学历。另外，各地区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在积极实施优惠政策吸引和留住高学历人才。分地区来看，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参差不齐。从图 4 到图 6 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与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紧密联系，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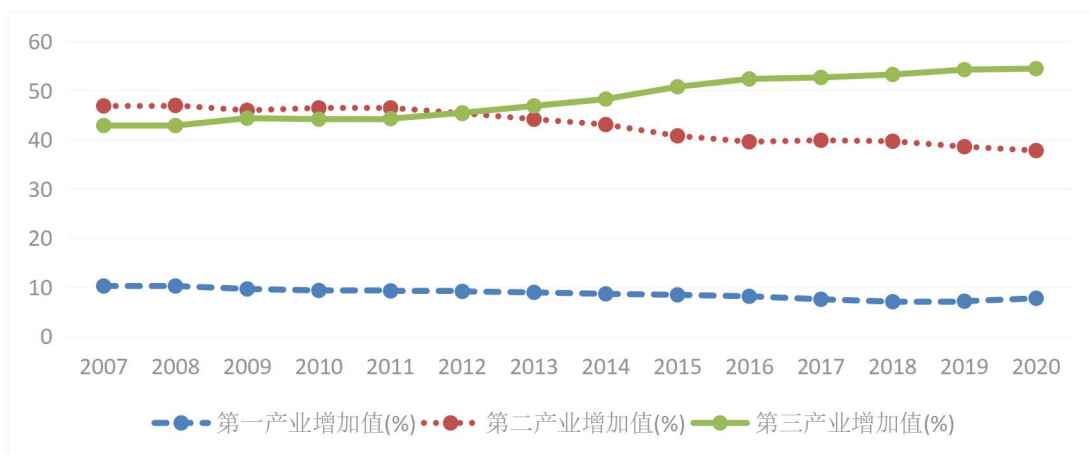
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容易吸引人才，同时大量人才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实现了良性循环。处于西部偏远地区的西藏、贵州等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北京、上海有较大的差距，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东部地区低，导致部分人力资本的外流，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教育环境等也存在差异，所以本地能够培养的人力资本也受到限制，导致人力资本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

3.3 产业结构升级现状分析

本节根据 2007-2020 年相关数据分别从产业结构、就业人口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方面进行现状分析。

3.3.1 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1. 三次产业构成现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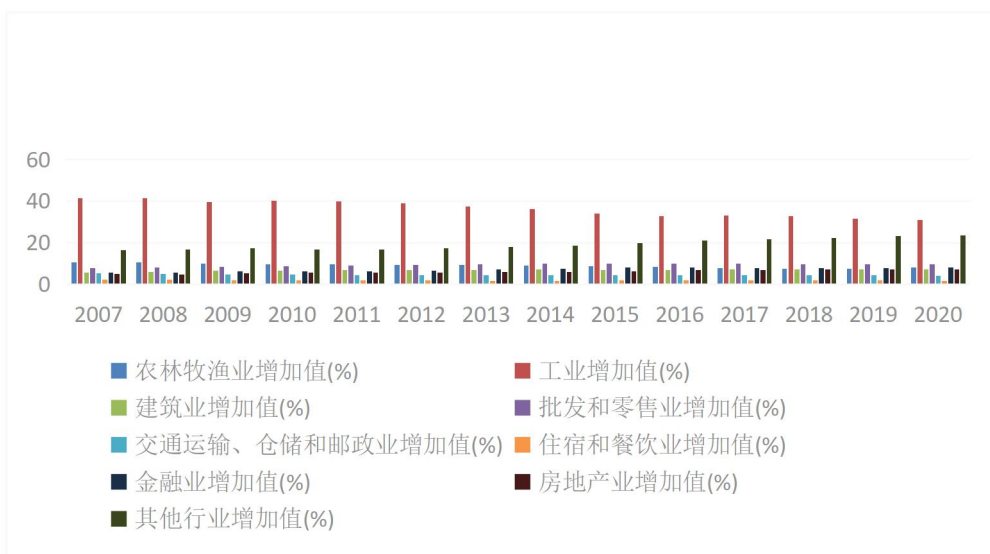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 3.7 2007-2020 年我国三次产业构成情况折线图

图 3.7 所示是 2007-2020 年我国三次产业构成情况，根据图 3.7 可以看出，在 2007-2020 年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几乎变化不大，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12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自 2013 开始，二者的差距逐渐扩大，与此同时，我国整体的产业结构也逐渐从“二三一”向“三二一”模式转变。从具体的数据来看，在 2007-2020 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270092.3 亿元增加至 1013567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由 27674.1 亿元增加至 78030.9 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由 10.2% 下降为 7.7%；第二产业增加值由 126630.5 亿元增加至 383562.4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由 46.9% 下降为 37.8%；第三产业增加值由 115787.7 亿元增加至 551973.7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由 42.9% 上升为 54.5%。通过以上描述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并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07 年的 0.102:0.469:0.429 调整到 2020 年的 0.077:0.378:0.545，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正朝着更高层次转变，产业结构逐步实现合理化和高级化，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克拉克提出的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表现为第二、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

2. 分行业构成现状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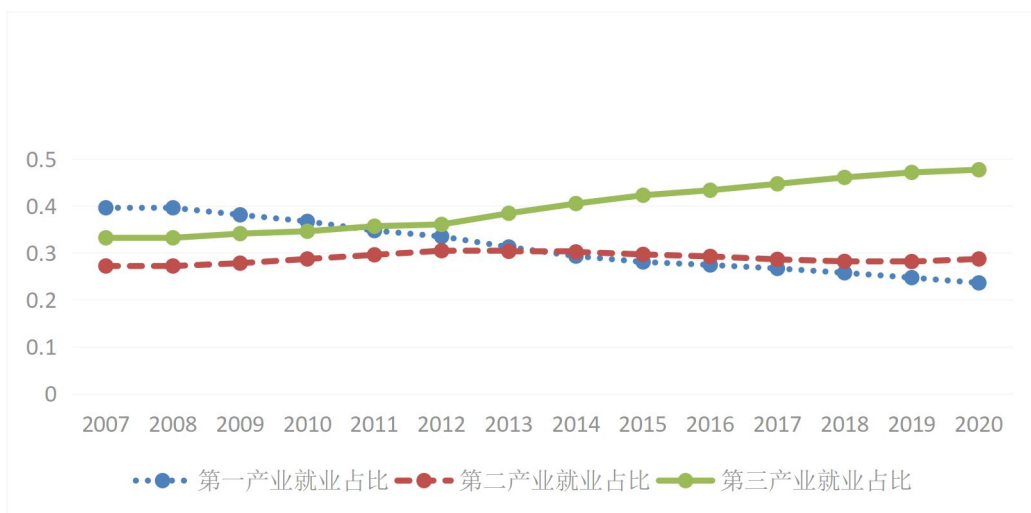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 3.8 2007-2020 年我国分行业构成情况柱形图

图 3.8 所示是 2007-2020 年我国分行业构成情况，根据图 3.8 可以看出，在 2007-2020 年间，我国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0.5% 下降为 8%，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41.4% 下降为 30.9%，建筑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5.7% 上升为 7.1%，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7.8% 上升为 9.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5.4% 下降为 4%，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1% 下降为 1.5%，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5.6% 上升为 8.2%，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5.1% 上升为 7.2%，其他行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16.5% 上升为 23.5%。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淘汰落后、低端的产能，坚持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必然趋势，产业结构正不断地朝着产业服务化的方向发展。

3.3.2 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现状分析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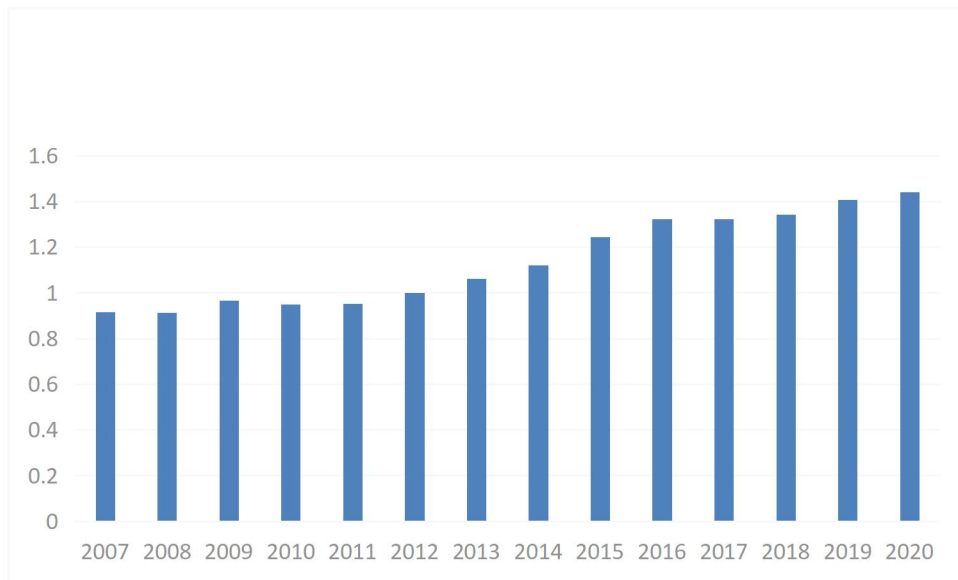
图 3.9 2007-2020 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情况折线图

威廉·配第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不断转移，在威廉·配第研究的基础上，克拉克又进一步提出劳动力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地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再转移至第三产业。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劳动力的不断流动。

图 3.9 所示是 2007-2020 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情况，根据图 3.9 可以看出，在 2007-2020 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从 2007

年的 39.6% 下降至 2020 年的 23.6%，下降了 16%；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几乎保持不变，在 30% 上下徘徊；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保持上升趋势，并且增速不断加快，从 2007 年的 33.2% 增加至 2020 年的 47.7%，上升了 14.5%，达到 35806 万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 2007-2020 年间，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力也不断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从 2012 年开始，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与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差额不断扩大，到 2020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数比第一、二产业就业人口分别多了 18091、14263 万人，这也进一步验证了“配第一克拉克”定律。

3.3.3 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整理

图 10 2007-2020 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情况柱形图

本节借鉴于春晖等（2011），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其值越高表明产业结构升级程度更高。图 10 所示是 2007-2020 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情况，根据图 10 可以看出，在 2007-2020 年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标志着产业结构在不断优化升级。其中在 2007-2012 年间，第二产业产值大于第三产业产值，自 2013 年起，第三产业产值开始大于第二产业产值。

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强调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战略任务。在该政策的积极引导下，给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第三产业能够得到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并逐渐形成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良性循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发达的金融市场和高水平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地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方向迈进。

4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分析

4.1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4.1.1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主要探讨公共物品的提供责任,论证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点,导致市场提供公共产品时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搭便车”现象,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需要提供公共物品。相比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承担着宏观调控的作用,即维持经济稳定和发展,协调居民收入再分配及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有其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资源配置方面,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决定了它更了解本地区居民的情况,能更有效率地为本地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分配充分体现了财政分权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财政分权界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及支出责任,确立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晋升而积极探寻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由于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更了解本地的实际情况,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再加上地方官员“任期制”的存在,决定了地方政府官员会将目标放在那些能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再者,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仅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发展情况给予相关企业财政拨款,而且可以通过实施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在此过程中,也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

显而易见,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能够影响当地产业发展策略及发展方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假说 1: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4.1.2 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从“干中学”与知识外溢的角度出发，人力资本有利于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对于产业结构升级至关重要。杨志安和李梦涵（2019）从实证角度为财政分权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49]。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关键要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当地的高等教育建设，改善教育设施，提高师资质量，重视就地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远期发展储备人才；另一方面通过人才引进来快速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重在解决当前迫切的人才需求。随着户籍制度的不断改革，大多数人开始“用脚投票”，选择能够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地方工作。由于高水平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各地方政府为获得更优质的人才展开激烈的竞争，竞相提供优质的待遇以吸纳人才，同时地方政府不断提高当地公共服务水平（包括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来吸引人才流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引导当地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给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倒逼着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企业们纷纷开始进行创新，这在推动本地区高附加值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总体来看，财政分权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2：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4.2 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理论分析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引入了激励相容机制，约束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防止其在财政权利下放至地方政府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作出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决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我国经济建设初期，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实现晋升而积极探寻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的重要任务，而如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创新，创新离不开人力资本，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已转变为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

由于高水平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各地方政府为获得更优质的人才展开激烈的竞争，地方政府为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视人们所关心的民生问题，竞相提供优质的待遇以吸纳人才，财政支出结构中的民生性支出也呈逐渐增长的趋势。首先是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当地的高等教育建设，改善教育设施，提高师资质量，重视就地培养人才，使之接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提高自身素养，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为产业结构升级的远期发展储备人才。其次是通过改善当地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生活环境质量，吸引要素流入和留住人才。随着高铁等现代交通的发展，使人才的流动更加便捷，大多数人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倾向于选择能够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地方工作生活，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有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于工作地的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 3：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4.3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理论分析

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源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不竭动力，人力资本的缺乏，会导致创新活力不足，抑制技术进步。一定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形成合力，促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一个地区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意味着该地区中具有高水平知识与能力的人所占的比例增多，高水平人力资本的集聚，有利于形成创新的环境，他们能够发现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机会，同时又具有研发新技术的潜力，这会在无形中实现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其他地区人才的流动。同时技术、知识的提升也具有外溢作用，可以辐射到周边地区，带动其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在某一区域的集聚，也会催生出新的消费需求，改变该区域的消费结构，这一过程也会带来相应的产业不断调整升级。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强调劳动者能力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经济飞速增长，因此有必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水平，并提出提高劳动者能力水平的五种方式，包括学校教育、成人学习、在职培训、健康和迁徙。教育是培养人力资本的直接途径，不同的教育形式也会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形成产生影

响。面对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不会被社会淘汰，产品设备功能的不断更新，都需要从业者进行不断地学习和在职培训，人的技能与高科技设备的错位，势必会导致产出效率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不断地学习以使从业者的技能水平能够紧跟设备的更新换代，才能发挥出更大的效力。健康状况是人的根本，健康方面的投资能够保障劳动者正常参与社会劳动，因此也是一种提高劳动者能力水平的方式。

当出现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个别劳动时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不同企业之间就会产生利润差。此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就会向高效率的部门流动，为了实现利润，产业结构升级较慢的企业不得不加快步伐追上产业结构升级快的企业，长此以往就促进了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说：

假说 4：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5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前面章节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并对我国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为接下来的实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本章节中,将对我国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前文提出的假说并对实证结果进行解释说明。

5.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5.1.1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升级 ($cyjgsj$),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是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状况的指标。按照“配第一克拉克定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特征,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低附加值产业不断地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的过程,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乃至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本文借鉴汪伟等(2015)用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来表示^[41],具体公式如下:

$$cyjgsj = \sum_{i=1}^3 Y(i) * i$$

其中 $Y(i)$ 为第 i 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cyjgsj$ 的取值范围是 $[1,3]$ 。其经济意义是 $cyjgsj$ 越趋近于1,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越慢; $cyjgsj$ 越趋近于3,表示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越快。

2. 解释变量

考虑到张浩天和李鑫(2017)、刘建民和胡小梅(2017)、甘行琼等(2020)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应当将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本文研究中,共同衡量财政分权,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借鉴甘行琼等(2020)将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分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17],具体公式如下:

$$\text{财政收入分权} = \frac{\text{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收入}}{\text{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收入} + \text{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收入}}$$

$$\text{财政支出分权} = \frac{\text{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支出}}{\text{人均各省份本级财政支出} + \text{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

3. 中介变量

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水平就会相对提高,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参考众多学者的做法,采用各个省份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数占各个省份6岁及6岁以上人口数的比重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4. 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模型遗漏重要变量,保证结果的准确性与稳健性,本文参考大量已有文献,选取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本文所构建的模型中,具体指标选取如下。

(1) 经济发展水平

GDP 是衡量一个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会对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一定影响。考虑到 GDP 受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影响,难以准确衡量各省真实的经济水平,因此将人均 GDP 作为衡量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2) 城镇化水平

考虑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带来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同时会带来资源和技术,可能会推动当地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从以第一产业为主逐渐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本文使用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

(3) 居民消费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会带来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企业们纷纷开始进行创新,这在推动本地区高附加值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即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动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各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 GDP 的比重来表示居民消费水平。

(4) 对外开放水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增多,会增加人们可选择商品的种类,改变人

们的选择。我国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以及其他国家对我国产品的需求都在不断变化,因此,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也会因其地理位置的不同受到对外开放水平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可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对外开放水平,其中,各地区进出口总额根据历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进行相应的转换,以抵消价格波动因素。

(5)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差异会对地区的经济建设产生影响,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倾向的不同会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影响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使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比来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5.1.2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2007-2020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验证前文提出的四个假说。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考虑到潜在的异方差及数据平稳性问题,本文对所有非比值变量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在实证分析中所应用的软件为stata15.0,所有的实证结果均在该软件中得出,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5.1所示。

表 5.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升级	<i>cyjgsj</i>	434	2.3519	0.1420	2.102	2.836
财政收入分权	<i>czfq_sr</i>	434	0.4928	0.1306	0.249	0.833
财政支出分权	<i>czfq_zc</i>	434	0.8471	0.0537	0.698	0.961
人力资本	<i>rlzb</i>	434	0.1236	0.0734	0.012	0.505
经济发展水平	<i>jfz</i>	434	10.6140	0.5703	8.841	12.013
城镇化水平	<i>czh</i>	434	0.5545	0.1422	0.215	0.896
居民消费水平	<i>jmx</i>	434	0.3005	0.0558	0.168	0.515
对外开放水平	<i>dwkf</i>	434	0.2827	0.3376	0.008	1.8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i>gdzctz</i>	434	0.7523	0.2553	0.21	1.507

根据表 5.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本文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升级, 其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最小值为 2.102, 最大值为 2.836, 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 0.734, 可见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升级情况存在较大差距, 产业结构升级的均值为 2.3519, 说明从总体上来看,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较高。解释变量财政收入分权最小值为 0.249, 最大值为 0.833, 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 0.584, 财政支出分权最小值为 0.698, 最大值为 0.961, 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 0.263, 反映出不同省域之间的财政收入及财政支出差距悬殊, 并且财政收入分权的最小值远小于财政支出的最小值, 可见, 在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 其财政压力相对较大。人力资本的最小值为 0.012, 最大值为 0.505, 可见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本分布不均衡。经济发展水平的均值为 10.614, 最小值为 8.841, 最大值为 12.013, 说明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城镇化水平的均值为 0.5545, 最小值为 0.215, 最大值为 0.896, 较大的城镇化水平差距表明我国部分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居民消费水平的均值为 0.3005, 最小值为 0.168, 最大值为 0.515, 对外开放水平的均值为 0.2827, 最小值为 0.008, 最大值为 1.8,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均值为 0.7523, 最小值为 0.21, 最大值为 1.507, 均体现出我国不同地区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

5.2 实证研究设计

基于前面章节的理论分析, 本文构造模型如下:

$$cyjgsj_{it} = \alpha_0 + \alpha_1 czfq_{it} + \alpha_2 jjfz_{it} + \alpha_3 czh_{it} + \alpha_4 jmx_{it} + \alpha_5 dwkf_{it} + \alpha_6 gdzctz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cyjgsj_{it} = \gamma_0 + \gamma_1 rlzb_{it} + \gamma_2 jjfz_{it} + \gamma_3 czh_{it} + \gamma_4 jmx_{it} + \gamma_5 dwkf_{it} + \gamma_6 gdzctz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 表示地区, t 表示时间。 $cyjgsj$ 表示产业结构升级, $czfq$ 表示财政分权, 分别为财政收入分权 ($czfq_sr$) 和财政支出分权 ($czfq_zc$), $rlzb$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 $jjfz$ 表示经济发展水平, czh 表示城镇化水平, jmx 表示居民消费水平, $dwkf$ 表示对外开放水平, $gdzctz$ 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λ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 将人力资本纳入分析框架, 借鉴 Hayes 检验中介效应

的方法^[3]，并结合模型（1）构建以下递归方程进行检验：

$$rlzb_{it} = \beta_0 + \beta_1 czfq_{it} + \beta_2 jjfz_{it} + \beta_3 czh_{it} + \beta_4 jmx_{it} + \beta_5 dwk_{it} + \beta_6 gdzctz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cyjgsj_{it} = \varphi_0 + \varphi_1 czfq_{it} + \varphi_2 rlzb_{it} + \varphi_3 jjfz_{it} + \varphi_4 czh_{it} + \varphi_5 jmx_{it} + \varphi_6 dwk_{it} + \varphi_7 gdzctz_{it}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rlzb$ 为中介变量，表示人力资本水平。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首先对方程（1）进行回归，检验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是否存在，若 α_1 显著为正，则说明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其次对方程（3）进行回归，考察财政分权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若 β_1 显著为正，则说明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最后对方程（4）进行回归，在 φ_1 和 α_1 均为正的情况下，若 φ_1 小于 α_1 ，则说明三个正向中介效应存在。

5.3 实证结果分析

5.3.1 基准回归分析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5.2 所示。

表 5.2 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cyjgsj</i>			
<i>czfq_sr</i>	0.706*** (20.51)	0.619*** (6.85)		
<i>czfq_zc</i>			1.406*** (12.21)	1.006*** (10.45)
<i>jfz</i>		-0.0752* (-1.68)		0.0843** (2.08)
<i>czh</i>		-0.0934 (-0.94)		-0.126 (-1.37)
<i>jmx</i>		0.0935 (0.57)		0.496*** (3.11)
<i>dwkf</i>		0.157*** (6.46)		0.143*** (6.34)
<i>gdzctz</i>		-0.0763*** (-3.17)		-0.131*** (-5.57)
常数项	1.973*** (90.30)	2.745*** (6.19)	1.176*** (12.78)	0.574 (1.35)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434	434	434	434
R ²	0.61	0.68	0.42	0.7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表 5.2 是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模型 2 和模型 4 表明,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系数分别为 0.619、1.006, 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 即财政分权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一。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正向影响, 反映出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 地方政府在实现当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适度的财政分权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政自主权, 在绝对信息优势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提高产业发展效率,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比较回归系数发现, 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整体上超过财政收入分权。

控制变量中, 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性; 城镇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负, 但结果不具有显著性; 居民消费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正, 说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会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对外开放水平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需求和国内需求的变化会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物质资本投入要和其他生产要素相匹配，盲目的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5.3.2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产业结构升级衡量指标

以克拉克法则为基准，借鉴干春晖等（2011），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分析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18]。具体结果如表 5.3 所示，表 5.3 中模型 5 和模型 6 分别是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所估计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说明前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2. 考虑外部冲击的影响

由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重要的外在影响，本文使用我国 31 个省份 2009-2019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5.3 所示，表 5.3 中模型 7 和模型 8 分别是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所估计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再一次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5.3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5	6	7	8
变量	<i>cyjgsj</i>			
<i>czfq_sr</i>	3.914*** (7.49)		0.633*** (6.04)	
<i>czfq_zc</i>		6.006*** (10.74)		1.072*** (9.28)
常数项	11.11*** (4.33)	-2.126 (-0.86)	2.852*** (5.23)	0.872* (1.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34	434	341	341
R ²	0.49	0.55	0.66	0.7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5.3.3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差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等）明显，在对全国样本进行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探究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5.4 所示。

表 5.4 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回归结果

地区	东部		中部		西部	
	9	10	11	12	13	14
变量	<i>cyjgsj</i>					
<i>czfq_sr</i>	0.385*** (2.80)		0.623*** (5.84)		0.277 (1.22)	
<i>czfq_zc</i>		0.398* (1.69)		0.260 (0.66)		1.378*** (5.51)
常数项	1.453** (2.57)	0.507 (0.88)	2.716*** (4.64)	3.403*** (4.70)	3.199*** (2.73)	1.029 (1.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54	154	112	112	168	168
R ²	0.89	0.88	0.83	0.76	0.35	0.45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从回归结果来看，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均与产业结构升级呈正相关关系，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但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系数大小有一定差异，表明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由于东中西部地区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等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导致它们经济发展条件存在异质性。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不同，面临的经济发展任务也不同，所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不同。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的适度提升能够提高产业发展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部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大于财政支出分权，表明收入分权的适度提升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提高，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产业发展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大于财政收入分权，表明支出分权的适

度提升能够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5.3.4 影响机制分析

表 5.5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分析

	15	16	17	18	19	20
变量	<i>cyjgsj</i>	<i>rlzb</i>	<i>cyjgsj</i>	<i>cyjgsj</i>	<i>rlzb</i>	<i>cyjgsj</i>
<i>czfq_sr</i>	0.619*** (6.85)	0.343*** (8.39)	0.292*** (3.31)			
<i>czfq_zc</i>				1.006*** (10.45)	0.479*** (10.81)	0.628*** (6.17)
<i>rlzb</i>			0.954*** (9.72)			0.789*** (7.92)
常数项	2.745*** (6.19)	0.415** (2.07)	2.349*** (5.83)	0.574 (1.35)	-0.678*** (-3.48)	1.110*** (2.7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34	434	434	434	434	434
R ²	0.68	0.76	0.74	0.72	0.78	0.7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由表 5.5 可知, 模型 15 是财政收入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总效应, 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 模型 16 是财政收入分权对人力资本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财政收入分权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模型 17 中财政收入分权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并且系数小于模型 15 中的系数, 证明存在中介效应; 同理, 模型 18 是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总效应, 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 模型 19 是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力资本影响的回归结果, 其中财政支出分权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模型 20 中财政支出分权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并且系数小于模型 18, 证明存在中介效应。综上所述, 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均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 这一结果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二。

模型 16 和模型 19 表示的是财政分权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其中模型 16 表明, 财政收入分权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系数分别为 0.343,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财政收入分权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显著为正; 模型 19 表明, 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系数分别为 0.479,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显著为正。综合来看, 即财政分权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

高，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三。

5.3.5 进一步分析

表 5.6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i>cyjgsj</i>			
<i>rlzb</i>	1.078*** (11.74)	0.963*** (17.64)	0.310 (0.79)	-0.253 (-0.61)
<i>jfz</i>	0.0256 (0.66)	0.100*** (3.55)	-0.142** (-2.17)	-0.0252 (-0.24)
<i>czh</i>	-0.306*** (-3.27)	-0.183** (-2.59)	0.448** (2.58)	-0.0983 (-0.37)
<i>jmx</i>	0.115 (0.76)	0.233* (1.82)	-0.574** (-2.52)	-0.128 (-0.35)
<i>dwkf</i>	0.195*** (9.30)	0.155*** (9.74)	-0.423** (-2.30)	-0.130 (-1.09)
<i>gdzctz</i>	-0.025 (-1.13)	-0.0103 (-0.51)	0.002 (0.05)	-0.0749 (-1.32)
常数项	1.985*** (5.06)	1.112*** (3.75)	3.625*** (5.49)	2.640** (2.49)
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34	154	112	168
R ²	0.74	0.96	0.77	0.3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由表 5.6 可知, 从整体上来看, 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 1.078,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影响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四。分析其原因, 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源泉, 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不竭动力, 人力资本提升会改善整体的劳动力构成, 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水平, 使其能够更快适应不断更新的技术。一定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形成合力, 促使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此外, 一定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能够减少企业为找到合适的人才所花费的成本, 提高了劳动力资源的匹配效率。另一方面, 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吸引了其他地区人才的流动, 同时技术、知识的提升也具有外溢作用, 可以辐射到周边地区, 带动其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在某一区域的

集聚，也会催生出更加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改变该区域的消费结构，这一过程也会带来相应的产业不断调整升级。

控制变量中，对外开放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为 0.195，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对外开放水平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给我国带来丰富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带动我国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需求，促进了我国的贸易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多反而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固定资产的投资要适应于人力资本的发展，使二者能够更好的协调以提高生产效率。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 0.963，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究其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东部地区拥有港口等位置优势，对外贸易较中西部更便捷，因而其产业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东部地区低，相应的社会福利及也薄弱，难以留住人才，人力资本水平要达到一定高度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显然中西部地区的人才较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因此，也就无法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大的影响。

5.4 本章小结

本章以 2007-2020 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四个假说。本文参考了众多文献，将财政分权分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以全国为样本，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分区域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从传导机制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均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作用；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人

力资本的影响显著为正，综合来看，即财政分权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本章在验证假说一、二、三的同时也对所得出的结果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随后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估计方程，实证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显著为正，即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影响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四。分区域来看，实证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影响为正但影响不大；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影响为负但影响不大，在得出一系列结果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6 结论及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首先通过文献综述详细梳理和总结了学者们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界定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同时阐述了相关理论基础。其次是对我国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探究了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提出本文的四个假说：（1）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3）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4）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接下来以 2007-2020 年我国省级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经过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后，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四个假说。具体来看，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以全国为样本，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系数分别为 0.619、1.006，且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即财政分权能够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说一。

第二，分区域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从回归结果来看，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均与产业结构升级呈正相关关系，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但东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系数大小有一定差异，表明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的适度提升能够提高产业发展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部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大于财政支出分权，表明收入分权的适度提升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提高，能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产业发展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分权大于财政收入分权，表明支出分权的适度提升能够通过优化支出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从传导机制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均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进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作用。实证结果显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财政分权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这一结果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二。

第四，财政分权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收入分权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系数为 0.343，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财政支出分权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系数为 0.479，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综合来看，即财政分权有利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三。

第五，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整体上来看，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 1.07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四。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影响为正但影响不大；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整体影响为负但影响不大。

6.2 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从整体来看，财政分权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分区域来看，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从全国的视角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分区域来看，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呈现区域异质性,这说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如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基于以上结论,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6.2.1 适时调整财政分权水平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按照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划分央地之间的财权、事权与支出责任,引导地方政府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发展,激发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活力;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调整财政分权水平,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在各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且随着各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善,财政分权水平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对于财政分权水平较低的地区,应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推进财政分权的深入化改革,完善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提高当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于财政分权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加强对当地政府的监督,防止自主权过度所导致的盲目投资、浪费资源等影响产业发展效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与此同时,还要注意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之间的对称性,促进二者协调作用于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6.2.2 完善政绩考核机制

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发展需要,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制,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等相关指标纳入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增加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的考核占比,防止出现仅注重任期内短暂发展,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发展;将居民满意度纳入考核体系,提高居民的监督意识,通过社会力量来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定期开展宣传讲座,通过走访、问卷调查等形式了解居民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及评价;面对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性,要避免地方政府之间出现恶性竞争,实现区域间相互帮扶、相互合作。充分发挥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间资源有效配置,共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区要以本地实际情况为依据,结合本地资源优势、地理位置、及政策优势等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政策,同时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不能盲目向发达地区看齐,适时调整投资偏好,避免过度投资,注重产业结构合理发展。

6.2.3 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

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对于市场可以提供的产品，应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做过多干预，对于市场不能提供或不适合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弥补市场失灵。面对现阶段的发展现状，应引导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由投资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更多的公共资源，吸引劳动力和资本流入，弥补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人才缺口；创新创造能力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由于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不确定，大部分企业不敢承担这部分成本，所以对于创新创造这类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优惠政策或创新奖励，扶持创新性企业发展，另外，在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创新上，政府不仅要带头参与，而且要发动社会的力量，让居民也参与进来，进一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改革行政命令式的产业政策，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主体的不当干预；高校具有浓厚的创造创新的氛围，政府要增加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投入，根据学校的不同，有针对性的提高教学质量，注重培养不同的创新能力，本科院校致力于学术培养，专科院校注重培养技术能力，既要培养创新创造人才，也要培养能够快速适应产业科技化、数字化的应用型人才，为产业结构升级输送不同的人力资本，同时，各地区也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使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经济的发展实现良好循环，要留得住人才。

6.2.4 企业应努力提高自身实力

产业结构升级的主阵地还是在企业，企业要承担起技术创新的责任，为自身谋求长期发展。企业内部要营造技术创新的环境，重视培养、挖掘创新型人力资本，经常开展研究与试验活动，坚持走创新道路，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通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此来获得长久的利润；要加强员工的培训和培养，健全创新型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体系，为员工制定明确的职业规划，努力打造一支创新精英队伍，同时完善激励制度，将物质奖励和精神嘉奖相结合，让人才有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建立符合企业发展理念的管理方式和文化模式，传递企业文化理念，让员工在企业能够获得归属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具有

前瞻性，将眼光放长远，能够抓住未来可能的需求，提前做好准备，立足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努力发现机遇，争取在危机中寻找转机。例如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可避免，老年人群的消费市场正在不断变化，应该积极探索其背后的机会，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转变为机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参考文献

- [1]Acemoglu,D.,and F.Zilibotti,“Productivity Differenc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1,116(2),563-606.
- [2]Development[J].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sation,1995,11 (2) :1-31.
- [3]Hayes,A.F. Beyond Baron and Kenny: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New Millennium [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2009,76(4):408-420.
- [4]Kuznets S S. Modern economic growth[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5]Kuznets S. National incom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49: 205-241.
- [6]Musgrave, R. A..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M]. New York: Mc Graw-Hill Book Company, 1959.
- [7]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 [8]Qian, Yingyi, and G. Rolan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1998 , 88 (5) : 1143-1162.
- [9]Rostow W.W.,1960,The Stages of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Tiebout, C. ,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5): 416 -424.
- [11]Weingast ,B.R.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 [12]白婧,冯晓阳.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0,36(04):67-71.
- [13]陈朝阳,孟繁倩,吕荣杰等.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研究[J].管理现代化,2020,40(05):106-110.
- [14]崔志坤,李菁菁.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产业结构升级[J].财政研究,2015(12):37-43.
- [15]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基于非期望产出模型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9(07):15-25+187.
- [16]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03):4-12+22.

- [17]甘行琼,李玉姣,蒋炳蔚.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改革,2020(10):86-103.
- [18]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05):4-16+31.
- [19]高春亮,李善同.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增长[J].财政研究,2019,No.439(09):21-32.
- [20]高琳.分权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人力资本的作用[J].管理世界,2021,37(03):67-83+6-8.
- [21]高玉胭.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与机制[D].中央财经大学,2019.
- [22]何菊莲,李军,赵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3,No.112(02):48-55.
- [23]何小钢,罗奇,陈锦玲.高质量人力资本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J].经济评论,2020,No.224(04):3-19.
- [24]胡晓双,裴潇.财政分权、环境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0,36(20):136-139.
- [25]黄琼,李光龙.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J].经济体制改革,2019(05):129-135.
- [26]加里·贝克尔著.人力资本.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 [27]科林·克拉克著.经济进步的条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28]李凡,马万里.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以政府人力资本投资为例[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33(07):61-68.
- [29]李国璋,刘津汝.财政分权、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基于 1996-2007 年分省面板数据的研究[J].经济评论,2010(05):95-102+111.
- [30]李敏,张婷婷,雷育胜.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人才大战”引发的思考[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11):107-114.
- [31]林春艳,孔凡超,孟祥艳.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动态空间 Durbin 模型[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7,33(06):122-129.
- [32]林勇,卓玛草.“双刃剑”上的中国财政分权——基于经济增长和波动效应的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03):117-122.

- [33]刘建民,胡小梅.财政分权、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 SDM 模型的经验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7,38(01):116-121.
- [34]吕勇斌,金照地,付宇.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J].财政研究,2020(01):25-44.
- [35]孟望生.财政分权、政绩考核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偏向——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劳动经济评论,2018,11(01):155-169.
- [36]史忠良.产业经济学.第2版.高等院校管理类教材[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 [37]孙海波,焦翠红,林秀梅.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基于 PSTR 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7,No.218(02):5-17.
- [38]孙海波,林秀梅.异质型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动态演变[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33(04):58-66.
- [39]孙萌,台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J].经济评论,2019(05):3-21.
- [40]孙勇.中国式财政分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J].经济问题探索,2017(09):135-143.
- [41]汪伟,刘玉飞,彭冬冬.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1):47-61.
- [42]王立勇,高玉胭.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省直管县”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18,39(11):145-159.
- [43]王帅龙,李豫新.创新型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2,38(14):174-178.
- [44]威廉·配第著.政治算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45]温娇秀.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J].当代经济科学,2006(05):109-113+128.
- [46]西奥多·W·舒尔茨著.论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 [47]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48]杨永聪,沈晓娟,刘慧婷.人才政策与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兼议“抢人大战”现象[J].产业经济研究,2022,No.120(05):72-85.
- [49]杨志安,李梦涵.财政分权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与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

- 据的实证检验[J].工业技术经济,2019,38(11):115-122.
- [50]杨志安,邱国庆.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基于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视角[J].财政研究,2019(08):27-36.
- [51]余靖雯.教育支出分权与地区人力资本[J].财经问题研究,2012,No.339(02):82-89.
- [52]余世勇,朱咸永.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经济增长[J].宏观经济研究,2019(07):40-51.
- [53]张浩天,李鑫.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失衡—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7(08):114-119.
- [54]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2008(01):21-52.
- [55]张莉娜,吕祥伟.中国式财政分权、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J].经济问题探索,2021(06):15-29.
- [56]张阳,姜学民.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6,No.387(02):106-113.
- [57]赵领娣,张磊.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No.311(07):13-19.
- [58]郑玉.人力资本集聚、空间溢出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空间过滤模型的区域对比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7,No.425(12):148-155.
- [59]周东明.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04):30-35.
- [60]周海银.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J].东岳论丛,2014,35(09):95-99.
- [61]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 [62]周业安,章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J].管理世界,2008(03):6-15+186.
- [63]周振华.论产业结构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J].中国经济问题,1990(01):1-8.
- [64]朱喜安,梁艳艳.异质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0,36(09):118-123.

致 谢

我们的大脑一半是感性，一半是理性。有的时候需要感性，有的时候则需要理性。理性帮助我们客观的看待世界，感性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温度。

今天，清晨的牛肉面馆依旧人流不断，中山桥上的旅客依旧络绎不绝，白塔山上依旧有人登高望远，黄河边的茶摊依旧有人悠闲自得地聊着天，而我依旧坐在兰财的图书馆，所不同的是，今天我写下了这篇致谢。时间总是在向我们做无声的告别，而这一次，我所面对的是与硕士生涯的告别，还没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要挥手说再见了。曾经，兰州对我来说是多么遥远，可当我脚踩这片大地，我走过这片土地，才发现我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热爱祖国的大西北。西北的美是热烈的，是“纵有风情万种，更与何人说”。我热爱这片陇原大地，因为它包容了我三年，这里有我敬爱的导师，有我同窗的挚友。回想起艰辛的求学路，更让我懂得成为一名硕士生的珍贵，感谢兰州财经大学的接纳，感谢王庆导师的接纳，所以三年来一刻也不敢松懈，努力上进。

我用三年的时间去攀了一座山，我的导师为我引路，我的父母为我准备行囊，我的师哥师姐提醒我路途遥远，我的同学们陪我一起爬山。我到达山顶，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当我正陶醉于居高临下的美景，忽而转过身去，看到远处群山密集，我才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行路至此，我们就要分别，再踏上各自的行程，前路漫漫，祝各位一切都好。再见了，兰州，这里有我的导师，有我的朋友，有我三年的青春，所以它是我的第二家乡。

时间是会说话的小偷，教会我们初识的惊喜和离别的不舍。它一面教我们要享受当下，一面又催促着我们不断前进，我讨厌它，让我们总是感受离别的伤感，我感谢它，留给我们一个又一个写满故事的记忆球。我伤心的是，即将面临与老师同学们的分别，我开心的是，我们同学即将踏上人生的新旅途，并有可能在新的环境中发光发亮。我多想感谢命运的馈赠，那些不是因为血缘关系遇到的老师们、兄弟姐妹们，都是命运带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不确定多年以后是否还有人记得，我们谈笑风生，眼里口里满是对当下的不舍和未来的祝福，但每当我翻开照片时，透过你们的眼睛我总会看到星辰大海，在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每一个人的笑脸，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相遇的意义。感谢你们从我的生命中路过，我们一起走过一段路，现在到了分叉口，我贪心的希望你们带上我沉甸甸的祝福，继续背上理想向前奔跑，愿你抬头是璀璨的星空，低头是繁花满地。

理想与现实就像我们的两条腿，我们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因为两条腿一

起走路，才能走的更稳，走的更快。不能因为现实而忘记理想，也不能沉迷于理想而忘记现实。我仍觉得那无数个奋笔疾书的日夜、无数个崩溃又自我治愈的瞬间、无数个含泪坚持的时刻，都在不经意间汇成生命的宽度。我始终相信一万个小时定律，那些晨间早起的挣扎、那些不眠之夜的辗转反侧、那些面对诱惑时清醒的克制、那些孤军奋战的坚持和流着眼泪暗暗许下的承诺，那些为了一件事，喜怒哀乐尽现的时刻，才是我真正热爱自己的时刻。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份坚持一直陪着你，变成了你面对一切的勇气。可能终其一生，我们仍旧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亲爱的你要明白，从平庸到平凡的过程本就足够我们骄傲的去过好这一生。接受着深爱事物的折磨，为它哭，为它笑，为它彻夜难眠，痛并快乐的活着，我想这才是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

在这看似平凡的日子里，每一天都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不知道多年以后老师同学们是否还会记得我，我不知道这平淡的一生是否还会激起一点水花，也不知道一个平凡的人的高度究竟在哪里，我想鼓起勇气试试，想为国家、社会、身边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朋友同学们，我没有什么太华丽的词藻，唯有这一颗真诚祝福的心！感谢你，此时读到这里的各位！也许是我敬爱的导师，任课老师，参与答辩老师，研秘，也许是我的朋友们，也许是素未谋面的每一个你，我都要感谢你，感谢导师的谆谆教诲，感谢任课老师的不吝赐教，感谢参与答辩老师为论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感谢研秘的耐心细心，感谢朋友们的陪伴，感谢每一个你的阅读！

晚风吹人醒，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离别！祝好！

2023年3月

兰州